

ZHONGGUOXIANDAI
XIANGTU WENXUE
DE
XUSHI SHIXUE

中国现代 乡土文学的叙事诗学

现代民族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兼论沈从文贾平凹

王建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乡土文学的叙事诗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学术论著出版工程·文学卷

王德威 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学术论著出版工程·文学卷

ZHONGGUOXIANDAI
XIANGTU WENXUE
DE
XUSHI SHIXUE

中国现代 乡土文学的叙事诗学

现代民族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兼论沈从文贾平凹

王建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诗学：现代民族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兼论
沈从文贾平凹/王建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8975 - 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乡土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680 号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走出现代文学

陈学超

“走出现代文学”，这是近年我回国后在不同场合几次讲过的一个观点。王建仓博士要我为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撰写出版的专著写序，又一次激发了我对这一话题的思考。五年前我和李继凯教授共同指导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建仓。建仓的硕士学位是现代文学专业，我和继凯也是现代文学专业出身，这样，就很容易驾轻就熟地使建仓的博士论文进入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可是建仓没有走这条已经十分拥挤但却路熟车轻之道。他的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运用中国古代诗学中“境界”和“意象”这些传统美学范畴，与西方叙事学理论结合，创造性地概括出“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这两个具有民族风格的叙事方法，尝试建构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他尽力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批评意识和作家作品贯通起来比较研究；他的阅读和研究视野，他的思考和写作方法，便大大超越了一般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从而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博士，曾经热烈地参与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在“拨乱反正”、“现代化启蒙”的时代潮流中先声夺人于一时。但是，我们也很快感到三十二年的断代史空间实在太狭窄了，怀疑小学科能否作出大学问，以后便自己主动地“走出去”，探讨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和学术领域。过了二十多年，当我从国外归来，看到成千上万的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一相对狭小、封闭的领域里孜孜矻矻地找选题、找角度、找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在对现代文学过度阐释的学术生态下，学者们还在不断地呼吁“返回”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这种现象使我看到，忽略社会价值的学院式、书斋式的研究，

对一个小学科的纯学科价值的追求,似乎成了一些研究者小圈子的内部交谈,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社群话语。一些学术术语只为学术策略服务,一些研究被强烈的主观臆想和理论选择所笼罩;一些学术论文只为学位或职称服务,不再承担或推动民族文化资源再造的任务。由此,我想到美国左派批评家贾克比(Jacoby),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说,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怯懦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对他们越来越不予重视。难道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也会沦入这种尴尬境地?我们一度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学会不会也有窒息之感?

历史是时间的延续,文学史是文学发展流变的过程的积累,需要一个对较长时段的源流考辨才能找到文学史的动因。比如周作人把明代的竟陵派作家和俞平伯、废名的作品联系起来,提出明末为新文学运动的起源的论点;如果他把俞平伯、废名和沈从文再和贾平凹的作品联系起来研究,也许对新文学运动的流变又有新的结论。将文学史过短、过度的割裂,导致它的学科任务相对狭小,加之以往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往往陷入“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窠臼,就直接影响了这一学科研究。作为研究生,其专业学习的范围自然会比其他学科小一些。如果再把一生都放在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中,更未免太局促了。我不赞成有人为现代文学写“悼词”,但支持更多的青年学子走出现代文学,把视野放开阔一些,把自己学科口径放大一些,把外语学好,把阅读面放宽,把文艺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功底打好,把汉语表达、中文写作的实际功力提高,以适应新时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建仓这本专著的内容和创新点,我们俩曾多次讨论过,在此处我不打算多说;它已经获得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它还要交给学术界、交给大众去漫漫评说。这本书的出版是他广博读书、深入思考、悉心研究的结果,是他跨出一般的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收获,也是他奉献给大学科、宽口径学习研究时代的一份答卷。作为一个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的教师,希望建仓能够以他广泛学习探索的激情和努力,得到他的学生的热爱;作为一个锐意进取的专业研究人才,希望建仓以这本专著为起点,面对新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新课题,面对学术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纠葛,继续补充知识、增值自我,坚持研究写作、回馈社会。“江

山代有才人出”，相信建仓会超越我们，建仓的一代会超越上一代，不断建设起新的学术高地。

2010年10月18日于曦斋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诗情中国向小说叙事中国的转型	(2)
一 诗歌抒情形态转向小说叙事形态	(3)
二 古典文学艺术的中和精神的现代转承	(4)
第二节 诗词的意象境界抒情向小说的意象境界 叙事转化	(9)
一 古典诗论的意象和境界范畴	(10)
二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决定的艺术审美之法	(20)
三 以境界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意象和境界论	(29)
四 意象和境界与叙事之关系	(32)
第二章 现代乡土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	(40)
第一节 现代意象叙事和境界叙事	(41)
一 20 世纪现代民族叙事实践和个性养成	(42)
二 两种基本范式: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	(53)
三 多元考察现代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	(60)
第二节 现代乡土文学的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	(77)
一 20 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综述	(78)
二 乡土叙事的本土文化亲缘性和价值二重性	(84)
三 现代乡土民族叙事的品格养成	(91)
四 典范个案:沈从文和贾平凹	(96)
第三章 沈从文境界叙事论	(100)
第一节 文学湘西:沈从文文学审美的湘西世界	(102)
一 “从文自传”	(103)
二 回眸“边城”和“湘行散记”	(107)
三 “长河寂寞”	(111)

四	从文化湘西到文学湘西的建构	(123)
第二节	忧郁境界叙事	(128)
一	化宇宙和自然生命意识为境界	(129)
二	境界叙事的整体性	(132)
三	境界叙事的统一性	(142)
四	超越表象的悬置思维	(149)
五	境界叙事的视点人物	(151)
六	境界叙事结构之法	(161)
七	其他重要物事类型意象	(169)
八	诗意地栖居	(181)
九	沈从文境界叙事的自觉以及批评界的认同	(185)
第三节	“乡下人”的湘西情话苦吟的自然人性	(192)
一	自然人性	(193)
二	“我是个乡下人”	(205)
三	湘西情话	(215)
四	“长庚”般的生命仰望	(224)
第四章	贾平凹意象叙事论	(227)
第一节	文学商州:贾平凹文学审美的商州世界	(228)
一	为时代呼唤的“远山野情”	(229)
二	以“后生”眼光看商州“浮躁”世相	(232)
三	以“作家”视角看商州,回到“高老庄”	(236)
四	从民俗到宗族,“秦腔”叹惋	(239)
五	从文化商州到文学商州的建构	(241)
第二节	混沌意象叙事	(243)
一	转意成象	(244)
二	整体意象叙事	(249)
三	混沌还原叙事	(256)
四	视点散漫贯穿	(264)
五	虚实相即	(271)
六	混沌意象叙事的关键要素	(275)
七	贾平凹的散文写作与意象叙事的关联	(282)
八	贾平凹意象叙事评价	(285)

第三节 “农民”的“秦腔”清唱的浮躁时代颤音	(286)
一 时代浮躁	(287)
二 “我是农民”	(295)
三 秦腔乡音	(302)
第五章 现代乡土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的诗学	
价值探幽	(313)
第一节 文化批评价值	(314)
一 世纪末的文化反思和民族文化反击	(314)
二 “生命境界”与“诗意地栖居”	(316)
第二节 “和谐”乡土文学的叙事预期	(318)
一 和谐——当下乡土文学的叙事语境	(318)
二 和谐——当下乡土文学的主题突围	(320)
三 和谐——当下乡土文学的自然人性 价值诉求	(327)
四 和谐——乡土文学叙事的审美预期	(329)
第三节 现代文学民族批评话语谱系重建的导向	(332)
一 西方批评理论的接受	(332)
二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民族话语谱系的自觉	(335)
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48)

第一章 导论

广义的叙事即人的存在。文化是人的存在历史的形而上积淀，即历史的元叙事。文学则是文化历史的审美叙事，它基于历史文化真实，但超越了历史原始状态，是历史文化价值再认知的复指表征，表现为主体自由审美的语言能指形态，包括叙事（狭义上的，即文学本体意义）和抒情两种。就中国文学而言，似乎从古典到现代经历了由抒情主体向叙事主体形态转换的历史演绎过程。若对古典文学作简单历史线性的矢量描述，从第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歌赞辛苦劳作和自食其力起，进入悠远的民族人文历史记忆和抒情时期，不论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论是先秦四言诗，也不论是汉赋五言诗，抑或是唐诗宋词，都让我们无限喟叹中国传统人文的诗情画意，总体的文学印象和记忆都是中国是抒情诗国，诗文传统几乎就是古典文学的传统。且不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①，“即使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至明清小说兴起之后，也没有真正改变诗歌二千年的正宗地位”。更不要说单是“在这‘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诗，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②。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从内容（言志、抒情）到语言形式（从诗经四言到离骚变体，经汉赋魏晋五言诗，再到唐绝律体新诗，然后到宋词，等等）契合和专一，志在抒情。

①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然而，历史毕竟经过晚清近代的过渡，跨入了五四，拉开了现代^①中国的帷幕。现代文明的历史宏大叙事、文化的现代化，毕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最大的一次较为根本的转变，20世纪中国文学^②自然因此发生了相应的根本转型。关于这种转变，当时觉悟者也多。譬如现代派新感觉小说家刘呐鸥在《热情之骨》中借主人公之口对来上海寻找古朴“黄金国”的西方人声称：“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③实际上，对于文学艺术审美而言，较之“内容”的转变，审美形态和形式的变化似乎更为关键、更加重要，因而更为本质化。文学审美的价值指向是揭示美、解释真、宣扬善、教化人性，这些价值取向在别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可能实现或包容，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还在于它的审美的抒情和叙事的策略。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从抒情传统逐渐转向叙事强劲，诗歌这一主要形态逐渐被小说叙事代替，现代叙事文学崛起，成为表达文化历史的主体形态。文学形态之所以能在20世纪巨型转身，说到底是对20世纪历史本事和文化叙事发生了根本转变的自觉回应，即中国历史从传统转向现代，文学也自然从传统诗歌抒情主体形态转向小说叙事主体形态，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历史是文学的基石。20世纪现代叙事文学就是对同时期文化历史同质同构并大致同步同向的艺术审美记录。

第一节 诗情中国向小说叙事中国的转型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传统诗歌抒情文学向现代叙事文学让步，诗

① 非特别说明，本书所使用的“现代”意义皆指向现代性，是对近代以来的20世纪中国文化内质抽象，与传统或者乡土相对；同样地，非特别说明，“现代文学”也是广义的现代性文学，更多的是使用其文化能指意义，但在时空规定上大致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相当，两者可以通用；“当代文学”则具体指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这也基本上是时下文学批评界的共识和通行做法。

② 本书在历史时空下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时，使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在文化视野下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时，则使用“现代中国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既有历史观照又有文化观照时则使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复指概念。这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时段的文学现象和实践的考察，可以并行不悖。

③ 刘呐鸥：《热情之骨》，载《都市风景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歌形态转向小说叙事形态，中国文学从诗兴昂然逐渐趋向叙事强劲，预示了现代叙事文学的新崛起。

一 诗歌抒情形态转向小说叙事形态

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实现了三级跳，“从正宗的诗文时代走向通俗小说时代，继而走向吸收外来文化的现代文学时期”^①。这种说法毫无疑问符合文学史实践，也说明了中国文学从诗歌向现代小说转型的内在轨迹。诗歌中国一统天下的时日被终结虽在五四，但强力的冲击实际发生要更早。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叙事就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的成就，已对诗歌主体格局造成较大的冲击，长篇叙事以《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为代表，短篇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就已达到传统叙事的巅峰。但从实际影响看，不论当年金圣叹等少数人多么富有卓见地认定“通俗演义”的《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等为“才子书”，但毕竟是少数人的小范围作为，并没有也不可能撼动明清时期依然如故的“诗歌帝国”气象。小说的民间、通俗、白话文、街谈巷议等状态决定了相对于主流的诗词正宗而言，它还只是暗流，依然只是一种正在酝酿的力量。即使是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源头的《红楼梦》的出现，也没能在当时改变这种局面。晚清近代以来，虽说民族主体性日益觉醒，文学内蕴的现代因素也越来越多，但其备受压抑，只能伺机而发。真正的现代小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的新文学发生后才一跃而起。五四文学以现代白话文代替古典文言文登堂入室，传统诗歌日渐衰微、颓靡，现代小说日趋兴旺发达，成为主体，叙事自觉并成为文学形态正宗。所以，小说中国的气象应从五四算起。

但是，毕竟 20 世纪本土完成传统诗歌中国向现代小说中国的转型是内在的正向移植，是古今中外历史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结果。换句话说，当我们鼓吹它是外来西化的文化产物时，其实，我们并没有否认它首先有着民族文化一脉相传的根底，这种转向和移植，深层潜移默化并起到平衡杠杆作用的动力点依然是传统民族文化

^①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3 页。

的心理结构。一方面，现代作者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价值取向、思维特点和文化心理结构都依然深层受制于传统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广泛的读者主体的文化心理也还乐于并习惯于迎合传统。这就使得即使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叙事文学（如同古典文学一样），也披上了浓浓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外衣。当然，从新叙事学角度看，小说叙事本就包括“符号现象、行为现象以及广义的文化现象”^①，而况中国叙事文学本身更是“高文化密度叙事”^②的结果。简而言之，现代叙事文学实际上在五四开端时，就是既现代又传统的双重建构，这决定了其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总体的民族化叙事走向。陈平原先生从“史传”和“诗骚”双向传统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引‘史传’‘诗骚’入小说，并非始于二十世纪初；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种广义的文体渗透才呈现如此特异的风采，促进或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③

二 古典文学艺术的中和精神的现代转承

作为元历史文化的审美能指表现的文学，不仅建构在文化之上，而且又内蕴于文化之中且与之齐头并进，即文学叙事就是对文化的一种特别的记忆记载和传承。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叙事之道（策略）和文化之道（主体精神）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所以，这里不妨先宕开一笔，就这两种道体之关系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给予澄清，然后以此为依据，从文与道之关系以及叙事与道之关系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扬弃，从而寻求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文化本源意义。

从叙事之道和文化之道之间的对应关系看，文化形态的自然之道可视为第一主体。认知主体之道，虽包罗万象，诸如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主体情感艺术审美观及语言观等范畴，但它们都遵循和回应第一主体，可视为第二主体。就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而言，第二主体实际上又分为两种主体形态：作者（主导视点）和读者（接受

① [美] 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引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②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③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主体视点)。第二主体主导视点进入叙事之后,由于先在的第一、第二主体之道影响,生成第三主体之道,即文本之道,文本言语世界,又遵循第二主体叙事之道。三种主体之道,最终实现文本化的关键显然是承上启下的第二主体的主导视点,即创作主体,也就是作家。从文学接受而言,读者以独立的且有着强烈主体意识进入阅读接受,从而对文本意义价值作出回应。所以,由此关系看,民族文化之道的现代传承,主要是通过文化载体的作家来赋予文本得以实现和文化载体之道的读者通过阅读接受引起共鸣的。

20世纪中国文学既然以叙事为主宗,我们就不妨从叙事学角度考察现代叙事是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精神的继承发扬的。从现代叙事角度看,视点,作为叙事主体精心设计的特别角度和特别姿态的叙事切入点,犹如万花筒之视镜,文本内蕴的无论多么丰富的文化精神都是透过它集中展示出来的。视点以或间接、或隐性、或折射,甚或直接形态呈现在叙事中,但它往往是创作主体的经历经验、文化教育背景、哲学思想、文化姿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立场、情绪等方面的一个高度集中的交结点,是暗示作者的立场、观念、价值观(取向)、情绪等的单一或者综合的标尺。文题(眼)、主题立意、结构布局、叙事技巧、语言个性设置,等等,都受制于视点。反过来说,透过视点分析,我们就能约略掌握一部作品所展示出的作者的某些真实面貌,对文本作现实还原分析。总之,视点是起点、尺度、角度,更是枢纽、关键和构建体系的支点。对于叙事文学而言,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是由此入手,然后逐一展开的。

视点往往是叙事主体或者主导,在文本中呈现为一个具体的独立认知主体,它有着自觉但有限同时也是独特的先验世界的感知、自我的世界想象、对待自然的姿态和生命的感知,等等。作家这一创作主体的书写必然融合进自我的全部的关于世界、自然、人事、感情的认知域值,但主要是通过视点主体折射出来,所以,创作主体与视点主体总是处于交融或者重合状态,这种重合成分可以无限大,但永远都是有局限非全值的认识值域,换句话说,作者主体永远不会完全等同于视点人物,最多是神形相似。小说文本表面看来无非是基本的人物、事件、环境几个要素,但是从深层次看似乎要复杂些,正如一个人的外表、头、身、手、足都可直观,但五脏六腑是隐蔽的,需要基

本的推理，而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气质、欲望等则需要想象。文学作品在外在的基本要素之下，内层隐含着更重要的阅读密码系列，这就是文本中的视点和由此形成的视角视线，或者叙事学所谓的人称、叙事时空、结构和言语，等等，它们共同架构起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读者在阅读中虽不能明显读出，但能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这些要素。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个人的文化修养、功利观、价值观等都隐含其中，在文本中以或明或暗的“身份”“角色”，以“有我”和“无我”两种形式呈现。它们可能造成境界氛围、声色犬马、境与人浑。如此一来，三道（作者、视点、文本叙事形态）合一，民族文化精神自然地贯穿到了文本，文学的文化精神得以体现。

就中国本土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精神。它萌芽于《周易》，基本成熟于先秦诸子百家，经儒释道以及禅学理学的高度融汇整合，历经千百年磨砺成长，最终结结实实地沉淀在了中华民族的人文血管里，根深蒂固地凝结在了每个中国人心里，成为一种世代潜移默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儒道合一，尤其自觉地倾向于民间本位的道家文化的自然人文观和世界观，影响着创作主体的情绪和审美诉求。道家的道，是一种哲学先验世界，是人类生存之先验境遇，以此，道家主张天人和諧一体，有机相容，人不大于天。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决定了中国人的交际实践崇尚和合，审美情趣以和为美，讲究对称、协调、节制和平和，注重整体统一。因此，中国古典文学总体就表现为文道、诗志、质文、善美、情理、意境和意言之间的和谐统一。不光中国传统诗歌以此为“雅乐”，中国传统建筑、书法、音乐、绘画等艺术都奉此为主臬，淋漓尽致地贯彻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正因为这个原因，有论家指出：“千年以下，‘史传’与‘诗骚’的影响于中国小说，已主要体现在审美趣味等内在的倾向上，而不一定是可直接对应的表面的形式特征。”^① 古典文学自不待言，即使是20世纪的叙事文学也依然如此。虽然文化传统中国逐渐转向现代中国，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在深层支配着中国人的情志。以五四为界，中国文学由传统抒情主体转向了叙事主体，现代民族叙事也日趋成熟，这除了着力借鉴西方现代理念方法，由此催生刺激和以此作为重要参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照以外，亦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精髓和艺术精髓背景实际上亦始终于无声处静静地参与到现代民族叙事的重构中，从未间断：古为今用与传统一脉相传而且老树新枝，茁壮成长；与现代叙事融合大放异彩，使得本民族现代叙事双向吸纳中外古今的叙事精神和观念，在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叙事对接对流中孕育出足以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现代叙事抗衡对话的中国现代叙事的民族品格来。20世纪以来，对本民族现代叙事贡献最明显、成就最突出的文学种类当是小说，小说中乡土题材的叙事尤其对民族传统情有独钟，大大地发扬了民族文学艺术的传统精华。就作家而言，几乎没有不受传统影响的。不论作家本人在他那个时代多么的热衷于追随所谓的“主流”、“先锋”或者是“新思维”，骨子里，文本所呈现的思想精神、地域风俗特征以及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叙事结构和视点设置的特征等，其实都有本民族的特色，甚至个别作家自始至终都还是“中国化”的。所以，杨义先生特别强调：“文化学思路的叙事研究，需要从中国叙事特色出发，先回到中国历史文化原点（元典）《易经》《道德经》一类儒道先秦诸子的轴心期文化经典（以期洞察古老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再是观念演进的梳理。还有就是语源语义入手对象形的原生和渐次发展的含义解释。”^①

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也融入了文化精神。叙事结构不仅是叙事的形式载体，也是叙事者精神图谱的自然甚至不自觉的外呈形式。“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了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② 中国文化的和合精髓决定了中国艺术最为主要的两极中和原则，这就“触及到中国叙事学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同，那么在此类对立相或殊相的核心，必然存在某种相互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或者换用一个外来语，存在着某种张力场。这就是中国所谓的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极，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